免责声明：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

误用和滥用的见证：评马蒂斯将军对效基作战的批判

A Misapplied and Overextended Example: Gen J. N. Mattis's Criticism of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达格·亨里克森少校 / 博士，挪威皇家空军学院，美国空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Maj Dag Henriksen, PhD, Royal Norwegian Air Force Academy, US Air Force Research Institute）

编按：效基作战（EBO）理论发轫于第一次海湾战争，成熟于此后数场战争之间，并写入各军种的作战准则及联合作战准则。此理论风行多年，被美国各军种看重。然而，时任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的詹姆斯·马蒂斯上将（海军陆战队背景，现任中央司令部司令）在2008年8月发布备忘录指示："立刻生效：联合部队司令部在训练、作战准则编写和联合专业军事教育中不再使用、支持或宣传涉及EBO的术语……我们必须认识到，'基于效果'一词存在根本的缺陷，引发太多的解释，违反战争的本质，以致混乱加剧，［战局］可预测性被夸大，远远超出这种方法所能达成的效果。"于是辩论顿起。此后，马蒂斯将军进一步在《联合部队季刊》2008年第4期发表文章"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关于效基作战的指导"（USJFCOM Commander's Guidance for Effects-based Operations）。本刊2010年冬季刊曾翻译发表美国空军赫基中校挑战马蒂斯将军观点的文章"澄清曲解和误解 — 效基作战理论没有错，错在用之不当"，更在此之前的2008年夏季刊发表英国空军帕顿上校"以色列2006年对黎巴嫩真主党之战 — 空军之败，抑或准则之败？"和美国空军休纳沃代尔中校"以色列之败 — 为什么？"两文。这些文章当可与下文参照阅读。

2008年8月14日，时任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的詹姆斯·马蒂斯将军宣布：效基作战理论已被"严重误用和滥用，以致对联合作战行动非但无助而且有碍。"[1] 将军的这一结论立足于经验和史料分析基础，所取史料，主要是2006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2]

本文认为，批判效基作战（EBO）理论固无不可，但马蒂斯将军所引用的战例不足支持其结论。以色列本国发表的《威诺格拉德报告》已经指出：以色列对这场军事行动没有清晰明确的战略，因此其作战规划既非"基于对战场的深刻了解"，亦非立足"以军事力量实现政治目标的基本原则。"[3] 缺乏明确认定的战争军事战略，亦即缺乏目标，当然削弱EBO理论或者说任何军事理论的相关性。换言之，如果出行而不知身往何方，那么使用什么出行工具就无关宏旨。于是，研究者在查找各种变量影响时就容易犯"采樱桃"的错误，即拣最大最熟的（比如EBO）摘，实际上EBO这个变量对以色列国防军在这场冲突中的失利而言，只是从属性的。从逻辑上讲，这场特别的冲突因其诸多因素，并不适宜作为严厉批评EBO的经验基础。

EBO = 效基作战

马蒂斯将军在《联合部队季刊》2008 年第 4 期发表的“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关于效基作战的指导”一文以及他给联合部队司令部 2008 年 8 月 14 日的备忘录（其中包括上述“指导”内容),都将矛头对准 EBO 理论。在“指导”文中，马蒂斯将军花了半页的篇幅解说以色列 2006 年战役，目的就是支持他的观点，他认为 EBO 理论有重大缺陷，实际上阻碍了联合作战行动的制订和实施。[4] 虽然将军也提到其他史料，但以色列战役是他在论证中最倚重的一场冲突。因此，人们只能假设将军相信这个战例最能说明他的观点。

本文在分析马蒂斯将军对 EBO 的批判时，着重评说其结论所立足的经验基础，而不是 EBO 理论本身。如果这个基础太薄弱甚至误导，那么就应该对其结论重新评估。也就是说，如果发现以色列 2006 年对真主党的战争并没有提供能证实 EBO 理论缺陷的充分经验证据，就有理由质疑马蒂斯将对此理论的结论。本文正是照此推理来解析将军之批判观点的基础，从中确定此基础是否包括了问题的关键——这场战争中以色列战略思考的局限性。

马蒂斯将军之批判观点的分析基础

虽然马蒂斯将军承认“以色列国防军在战争期间表现不佳有几个因素”——这些因素不完全与 EBO 相关——但是他指称：“冲突后各种评估得出的结论是，导致［以色列］失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过度信赖 EBO 理论。”[5] 将军的“指导”一文中所提到的“冲突后各种评估”包括：(1) 阿维·科柏（Avi Kober）的文章“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为何表现不佳？”；(2) 马特·马修斯（Matt M. Matthews）的专著《我们措手不及：

James N. Mattis

USJFCOM

Commander's Guidance for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评 2006 年真主党与以色列的战争》；(3)《威诺格拉德报告》。[6] 因此，了解这三份文献的评估分析精确性，对判断将军的总体结论是否正确具有重大意义。

科柏教授对这场战争给出有趣的分析，其中就以色列国防军为什么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表现如此糟糕提供了九种解释：(1)“较晚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战争”；(2)“坚持后英雄战争原则”和对战场伤亡人数很敏感；(3) 两场叛乱的治安使命对“以色列国防军作战标准造成侵蚀”；(4)“运用假军事革命激发的理论”；(5)“采纳的是控制而不是占领领土观念”；(6)“后勤系统集中化”；(7)“军事领导人统帅无方”；(8)“政治领导人犹豫不决和缺乏经验”；(9)“以色列国防军强势主导军事事

务决策”。[7] 科柏的文章在有关这场冲突的研究中占重要地位，对希望理解这场战争的人有借鉴作用；然而，应该注意几点不足。此文虽然写得好，而且涵盖了广泛的因素，但是它对这场战争的战略动态因素重视不够，其中包括以色列与黎巴嫩局势的互动变化，黎巴嫩的国内动态发展，以及——最重要的——以色列开战决定中缺乏充分的战略思考。不过，科柏的确指出了以色列延宕很晚才认识到这是一场战争，以色列的政治领导层缺乏经验，而且以色列国防军军官队伍知识传统太弱。然而，以色列战略思考不充分原本是整个问题的核心，却没有在此文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不只是这场战争中的众多失误之一，而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从逻辑上讲，从一开始就缺乏战略指导，不知道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目标，这对其它因素的影响极大。此外，科柏并没有明显指证 EBO 理论是这场战争失利的一个关键原因，而是罗列了造成以色列国防军困难的许多原因。他的结论中包括了对过度依赖空中力量、技术、网络中心战，以及其它“军事变革”相关概念的泛性批评。科柏说得对，如果部队结构、训练和作战准则可能有损战术、战役和战略灵活性，就应对之持怀疑态度。但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理由在此文章中把 EBO 从对战争结局影响重大的多项变量中挑出来，将之列为上述［以色列］失利的“主要因素之一”。

从马蒂斯将军“指导”文中的引述和脚注数目来看，马修斯的《我们措手不及》文似乎对将军的影响最大。该专著由美国陆军联合武器中心发表，与科柏教授的上述文章相比，在论证的力度和平衡性上都差得很多，且对 EBO 表现出极端的蔑视。马修斯的专著由蒂莫西·里斯上校（Col Timothy R. Reese）作序，序言称：“他［马修斯］的研究令人信服地指出，以色列对知之甚少和备受争议的效基作战（EBO）和系统战役设计（SOD）作战理论的依赖，以及几乎全部依靠空中力量的战法，是以色列问题的根源。”[8] 在文中有些地方，作者的语言貌似规范，以至于似乎作为学术分析不够严肃：“六年来，以色列国防军对巴勒斯坦开展平叛作战，发展出植根于 EBO 的作战准则和高科技作战魔术。”[9] 如马修斯所言，马蒂斯将军选择引用了以色列阿米拉姆·列文少将的话，列文显然认为以色列的新（EBO）战法“与经营军队的最重要基本原则完全相左……没有以战争的普遍基本原则为基础，甚至无视这些原则……这不是好概念和坏概念的问题，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概念，它不可能成功，也绝不应该依赖。”[10] 将军还援引马修斯的分析：“‘以色列国防军内的 EBO 支持者相信，对敌方关键军事系统进行精确空袭，能够彻底瘫痪敌人’，而且‘由于不需要消灭敌人,所以只需要很少、甚至不需要地面部队。’”[11] 在一定程度上，这段引述揭示了美国陆军联合武器中心出版的马修斯文章的基调，这是一份以陆地为中心的分析，用作者的话说，“目的是为当今的美国陆军军官提供有效和重要的教训。”[12]

马修斯的研究，缺乏把握政治和军事全局动态演变所需的广度和平衡，这一事实在其四个章节的标题中有所体现：“第一章：以色列 2000 年从黎巴嫩撤军”；“第二章：策划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第三章：打响战争：7 月 12 日—7 月 16 日”；以及“第四章：地面战：7 月 7 日—8 月 14 日”。这一缺陷为过分渲染 EBO 的作用做下了铺垫。科柏把缺乏战略思考和指导列为导致以色列国防军在战争期间出现问题的若干因素之一，而马修斯几乎没有触及这一点。换句话说，马修斯的分析没有论及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在这场战

争中的作为，而事实是，以色列领导人既没有为战争提供军事战略，也没有充分确定要实现的目标。文章既然没有谈及这个本质问题，当然也就缺少任何关于这些关键因素如何与一系列其它因素相互作用的讨论。而这些正是本文需要着重指出的——研究中犯了根本性的分析错误，必然严重削弱其结论的可信性。

此外，读者还会遇到一些困惑，比如问题的症结究竟是在 EBO 理论本身还是在它的支持者方面（例如口无遮拦的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丹·哈卢茨将军，本文稍后讨论）；又比如 EBO 理论与其它诸种理论及改进技术之更普遍特征的区分边界在哪里；再者，远程精确武器、对技术的更大依赖、对空中力量信念的普遍增强、网络中心战，军事革命、系统战役设计，以及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作用的其他诸因素，所有这一切是否有必要都牵连到 EBO 理论？马修斯的研究似乎更像是对“过去的思维方式”的笼统批判，指责这种思维方式过度关注以上诸因素，而忽略地面部队的作用及全面控制战场的必要性。虽然这样的说法也有几分吸引力，但整个分析如能对 EBO 理论的内在优点和缺点做更准确和更平衡的讨论，本可加强说服力。作者所选择的对 EBO 的分析方式似乎生来就缺乏学术诚实——这种方式削弱了分析的准确性，由此进一步影响了其结论的可信度。当然，他的这篇专著也有诸多有趣论述，对有些问题的剖析也具有说服力，但作为整体，这份研究全盘否定 EBO 理论，故而不是一份值得称道的经验性案例研究。

马蒂斯将军以《威诺格拉德报告》作为其评估 EBO 的基础，但在某些引述中有断章取义之嫌。如本文所示，此篇报告的关键发现是认定以色列政府和国防军领导班子在开战时缺乏充分的战略思考，而不是对 EBO 理论的严厉批判。《威诺格拉德报告》指出：以色列在还没有充分考虑好想达到什么目标之前，在还没有透彻了解作战背景之前，就仓促投入战争，从而“限制了以色列的选项范围。”[13] 该报告的结论认为：以色列在“缺乏战略思考和规划的重大失误和缺陷下”，在“决策过程中以及政治和军事层级关系及其接口中充满严重失误和缺陷下”投入了战争；报告还发现“以色列国防军统帅部在战备质量、作战决策和执行中都有严重失误和缺陷”。[14]

《威诺格拉德报告过渡版》对战争中三个主要人物的评价尤其苛刻：总理奥尔默特，国防部部长佩雷茨和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卢茨将军。[15] 该报告虽然表示其他许多人共同承担这场战争失误的责任，但是指出：“发动迅速、密集军事攻击的决策没有基于详尽、全面和授权的军事计划，也没有基于对黎巴嫩战场复杂特点的仔细研究。”[16] 报告认为，如果这三人“能做得更好，那么在有关期间所制定的决策、决策的形成方式以及战争的结果，原本可以好出许多。”[17] 报告指责总理“在没有收到也没有索要详细军事计划的情况下就草率决策”；并批评总理“尽管没有外交政治和军事经验，”却没有系统地向别人咨询。[18] 该报告对国防部长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称他“在军事、政治和政府事务方面没有知识或经验。对使用武力达成政治目的的基本原则也不具备良好认识，”并据此得出了摧毁性的结论：“在所有这些方面，国防部长未能履行其职能。因此，他在战争期间担任国防部长损害了以色列应对挑战的能力。”[19] 此外，该报告宣称参谋长“没有对士兵被绑架事件做好思想预备，尽管先兆多次出现”，而且在绑架事件发生后“他又凭冲动做出反应。”[20] 实际上，以色列自己的“威诺

格拉德委员会”将其总理、国防部长和国防军参谋长等人，贴上了管理战争不称职的标签。

以色列战略思考的局限

根据《威诺格拉德报告》，由于缺乏对战争有效的管理，使得以色列只有两个主要军事选项，各有“其内在逻辑联系，及其相应的成本和缺陷”：

> 第一个选项是对真主党实施短暂、剧痛、强大和突发的打击，主要是通过远程火力。第二个选项是发起大规模地面作战，大幅改变黎巴嫩南部的现实，其中包括临时占领黎巴嫩南部，“清除”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21]

换言之，如果以色列对战争的管理更为充分,原本可有更多的选择,但情况并非如此，于是这两个备选方案就代表了全部，只能两中择一。从逻辑上来说，最终的选择取决于以色列想达到什么目标——可是这个目标在当时并不明确。

以色列很少有人愿意入侵黎巴嫩并以长期占领方式铲除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威胁，他们不想重蹈 1982—2000 年的痛苦占领经历——至少不是以两名被绑架士兵的生命危险为代价。因此，即使大规模的地面行动也只能满足有限的战略抱负。《威诺格拉德报告》给出了应该是正确的评估:在现实中，对战争的处理使得以色列只有两种主要军事选项，即使是其中最强硬的军事选择，实际上也已弱化成如上所列的“临时占领黎巴嫩南部，清除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在第一次黎巴嫩战争（1982 年）中担任营长并后在 2006 年担任以色列北方司令部副司令员的艾耶尔·本 - 鲁文将军指出：

> 当我们在 2000 年从黎巴嫩撤出时，就处于弱势地位。我们觉得，撤军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待在那里还能做什么。我们每年都有伤亡，除了保护边境以外，我们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当地民众对我们在黎巴嫩驻军的仇恨不断增加。我们在黎巴嫩驻扎了 18 年。作为 2006 年北方司令部副司令员，我非常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留在黎巴嫩。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计划是，集中大量兵力打一场短平快战争，力争实现有限的目标。[22]

此论述对使用空中力量和远程火力的有限作战选项也同样适用。锁定和打击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武装肯定不能铲除真主党对以色列的未来威胁。在战争之前以色列空军曾指出，它不能有效地应对短程“喀秋莎”火箭弹。[23] 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武装，战术运用空中力量对整个作战只能起到有限的帮助。[24]

尽管如此，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如果以色列重建其中断的威慑态势，提高真主党和黎巴嫩社会抗拒以色列的总成本，那么空中力量的相关性将显著增加。[25] 对此，本 - 鲁文将军说:“如果你问我关于这场战争的参数，我们杀死了 700 多名真主党士兵和恐怖分子，我们对他们所有人表明，如果你们绑架以色列士兵，我们会“疯狂”，我们将竭尽全力与你们作战。[26] 哈卢茨将军也说：“这个概念就是做出超过预想的反应——远远地超过、极大地超过——使（敌人）付出损失和代价，使他们再也不敢做这样的事情。我要他们付出巨大代价，叫他们下次胆敢破坏现状之前十思而后行。”[27] 但是这样的思考在以色列发起攻势时并不明确，并在战后也未成为人可的战略。此外，对军事手段和概念的选择，以及对具体组合的使用，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应为实现目标提供政治

指导和方向，应为设定军队必须达成的目标提供军事战略。方向既不明，无论其遵循的军事理论如何，都必定严重削弱战争的胜算。总的来说，这就是 2006 年以色列对真主党作战的情况。

在以色列开战前不久才卸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埃朗德将军认为，**本应**设定战争的战略目标，主导以色列的战争响应：

> 战略目标就是解答一些最重要问题：首先是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怎样做才能实现战略目标？最后还要自问，我们计划如何执行任务以实现这一目标？这些问题需要在战略层面上以非常明确的方式给予回答，然后传达给军事层面。可悲的是，在这场战争中，这个过程缺失了。[28]

与《威诺格拉德报告》的结论相一致，埃朗德将军坚持认为："在那天，以色列政府并没有就如何应对绑架事件进行务实、认真和专业的讨论。"埃朗德说，实际上政府只是简单地决定"开始进攻黎巴嫩或在黎巴嫩境内进行进攻，然后（再决定）以后采取什么行动。这样一个在政治层面上的决定，使得军事层面几乎无法制定出明确和良好协同的军事计划。[29]

同样，《威诺格拉德报告》得出结论说："这一结果（未打赢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从一开始，战争的进行就没有基于对战区形势、对以色列国防军战备状态、以及对使用军事力量来实现政治和外交目标这个基本原则的深刻理解。"[30] 就是说，以色列人自己对战争失利所列举的关键因素中，似乎并没有立即包括任何具体的军事理论，而只是包括了政治和军事战略层次上对这场冲突的处理方式，指出这种处理方式被证明不充分和不胜任。

关于以色列国防军对 EBO 理论的依赖程度，埃朗德将军指出：

> EBO 不是问题。对此理论的所有质疑都是缺乏根本的理解，因为所有军事理论的运用——无论是运用空军还是地面部队或者其它手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众多的变量。所以问题不在于运用哪种理论，而在于如何根据地形、敌人和其它各种因素选择正确的答案组合。在 2006 年的战争中，这还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在政治层面上缺乏战略认识，政治领导人没有能够就一些关键事项提出问题和提供答案，这些问题包括：这场作战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为实现这一目标应确立什么使命？如何执行这一使命？缺少这些答案，以色列国防军不可能、也没有拿出完善的军事计划。[31]

以色列总体上不愿意再次在黎巴嫩卷入地面军事冲突，视地面军事行动为泥潭，这种看法成为影响这场战争打法的关键塑造因素之一。本 - 鲁文将军说，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塑造因素是，当以色列国防军在 2000 年撤出黎巴嫩时，"以色列社会和以色列政治家已经不想再听到'黎巴嫩'这个名字，他们不想回到那里，重新卷入进去。"因此在发生绑架事件后，动员预备役准备以大规模地面部队入侵黎巴嫩南部的想法显然不是首选。[32] 相反，正如哈卢茨将军所解释的那样："地面部队成为最后的选择。我们当然不希望重蹈上一次黎巴嫩战争的经历。事实上，以色列政府从开始就毫不含糊地向我解释说，他们对在黎巴嫩开展地面战役不感兴趣。"[33] 两位将军都注意到了以色列政界及整个社会希望规避某些风险的意愿和更普遍的看法，这就是必须把伤亡人数作为一个关键因素来考虑，必须将其保持在最低限度。的确，这个因素影响了这场战争的政治和军事手段。

地面入侵可能造成的自身伤亡成本，必须与被绑架士兵的相对成本和有限地面作战的潜在收益相比较。[34]

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色列的政治家似乎更倾向于使用空中力量。本-鲁文将军说："哈卢茨将军告诉我们的总理，他有一个新的战法理论，这就是从空中作战，不使用地面部队——没有或极少兵员伤亡——整个政治领导层面当然非常、非常欣赏这个建议。"[35] 哈卢茨将军反驳说：这种说法完全不正确；与总理和其他人的讨论内容根本不符。然而，从更全面的角度，哈卢茨也承认："空中力量已经变得更为重要——至少在以色列社会是这样——因为以色列社会对军人伤亡越来越敏感。对伤亡的更强烈敏感意味着，你必须使用实质上不会引发大规模伤亡的手段和方法。"[36] 他宣布，那种认为以色列采纳了美国发明的 EBO 理论的看法是有缺陷的，他并说美国空军和以色列空军之间关系密切，但是以色列人根据自己过去几十年独特的经验，有自己的一套战法：

> "效基作战"这个词汇不足以正确地描述我们打仗的方式或战法。EBO 不仅仅与空中力量相关，还可以与陆军或者海军相关。空中力量是能够实践 EBO 理论的工具之一。可以说我们处理战争的方式中有一些 EBO 元素。我不认为我们采纳了 EBO 理论，我们只是根据以色列战区和中东战区的需要发展应用了这个理论的某些部分，仅此而已。[37]

和哈卢茨将军一样，本-鲁文将军强调主要的问题不在于 EBO：

> 不幸的是，我们战略层面上的三大总管不胜任这项工作。我们有一个对国家安全经验太少的总理，一个对战争和黎巴嫩战区一窍不通的国防部长，和一个过于依赖空中力量的参谋长。我绝对支持《威诺格拉德报告》，它指出了战略层面改善决策能力的必要性，以及拥有一个更好、更专业，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决策团队的必要性。[38]

结语

虽然我们可能有许多理由批判 EBO 作战理论，但是选择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作为实证来支持这种批判会引起误导。如本文所示，如果支撑这些指责的史料基础本身就缺少内容，这个事实将对关于该问题的后续辩论产生影响。本文就对战争的总体处理方式是否存在严重缺陷间接提出疑问，而不是探讨 EBO 理论本身的缺陷，这实际上是在揭示过去二十年战争中的关键问题。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许多战争（波斯尼亚、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和以色列），似乎在运用武力的最基本前提上有着明显的重大缺陷：缺乏全面的军事战略思考。休·斯特罗恩教授（Prof. Hew Strachan）在其著名的文章"战略的意义之失"中指出："国家……有必要重新掌握对战争的控制和方向。这正是战略的目的。战略旨在使战争为国家可用，如果需要的话，国家可以使用武力来实现其政治目标。"[39] 辩论 EBO 的正与误，若像马蒂斯将军等人那样，不承认战略思考这个更普遍的挑战，而是片面地理解战争并以其为据来支持其对 EBO 理论的批判，似乎缺乏学术诚实和造成分析误导。把军事战略这个大问题考虑在内，将不仅有益于对 EBO 的辩论，更重要的是，也有益于对武力运用的更广泛的讨论。♣

注释:

1. Gen J. N. Mattis, commander, US Joint Forces Command, to US Joint Forces Command, memorandum, [致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备忘录], 14 August 2008, 1, http://smallwarsjournal.com/documents/usjfcomebomemo.pdf. 本文不辩论 EBO 理论本身的是与非，而是讨论马蒂斯将军评估这一理论概念的方法。因此，本文认为 EBO 的一般定义，特别是由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所赋定义，对读者而言已足够；并且马蒂斯将军作为司令官，在书写此备忘录时可能已对此定义了然于心："[EBO 是] 一个通过在所有冲突层级上协力并积累使用全范围军事和非军事能力，获得预期战略结果或对敌行动奏效的过程。"另参看 Lt Col Allen W. Batschelet,"Effects-Based Operations: A New Operational Model?"[效基作战：一种新作战模式 ?], strategy research project, (Carlisle Barracks, PA: US Army War College, 9 April 2002), 2, http://www.iwar.org.uk/military/resources/effect-based-ops/ebo.pdf.
2. "USJFCOM Commander's Guidance for Effects-Based Operations"[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官关于效基作战的指导], Joint Force Quarterly, issue 51, 4th quarter 2008, 105-108, http://www.ndu.edu/press/lib/pdf/jfq-51/JFQ-51.pdf.
3. Winograd Committee Submits Final Report [威诺格拉德委员会提交最终报告],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30 January 2008, 第 19 点 , http://www.mfa.gov.il/MFA/MFAArchive/2000_2009/2008/Winograd+Committee+submits+final+report+30-Jan-2008.htm?DisplayMode=print. 2006 年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结束后，以色列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由退休法官威诺格拉德担任主席。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总结以色列与真主党战争的经验教训，于 2008 年 1 月公布了最后结论。
4. 见注释 1 中 Mattis 司令备忘录，第 4 页。
5. 见注释 1 中 Mattis 司令备忘录，第 2 页。
6. Avi Kober,"The Israel Defense Forces in the Second Lebanon War: Why the Poor Performance?"[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为何表现不佳 ?],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1, no. 1 (February 2008): 3-40,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01402390701785211; 另参看 Matt M. Matthews, We Were Caught Unprepared: The 2006 Hezbollah-Israeli War, [我们措手不及：评 2006 年真主党与以色列的战争], Long War Series Occasional Paper 26 (Fort Leavenworth, KS: US Army Combined Arms Center,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Press, 2008), http://www.dtic.mil/cgi-bin/GetTRDoc?AD=ADA477851; 另参看"Winograd Committee Submits Final Report"[威诺格拉德委员会提交最终报告].
7. 见注释 6 中 Kober"为何表现不佳"文，第 3 页。
8. 见注释 6 中 Matthews"我们措手不及"文，第 iii 页。
9. 见注释 6 中 Matthews"我们措手不及"文，第 3 页。
10. 见注释 1 中 Mattis 司令备忘录，第 4 页；另参看注释 6 中 Matthews"我们措手不及"文，第 62 页。
11. 见注释 1 中 Mattis 司令备忘录，第 4 页；另参看注释 6 中 Matthews"我们措手不及"文，第 24 页。
12. 见注释 6 中 Matthews"我们措手不及"文，第 3 页。
13. 见注释 3 中"威诺格拉德委员会提交最终报告"，第 13 点。
14. 见注释 3 中"威诺格拉德委员会提交最终报告"，第 12 点。
15. "威诺格拉德报告过渡版"于 2007 年 4 月 30 日发布。参看"Summary of the Winograd Committee Interim Report"[威诺格拉德委员会报告过渡版摘要], Jerusalem Post, 30 April 2007, http://www.jpost.com/Israel/Article.aspx?id=59701.
16. 同上第 10 点。
17. 同上，第 11 点。
18. 同上，第 12 点。
19. 同上，第 13 点。
20. 同上，第 14 点。
21. 见注释 3 中"威诺格拉德委员会提交最终报告"，第 13 点。
22. 笔者 2010 年 6 月 29 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对 Eyal Ben-Reuven（本 - 鲁文）将军的访谈。
23. 见注释 6 中 Kober"为何表现不佳"文，第 24 页。

24. 有关真主党如何采用战术避开以色列空中力量、精确制导武器和远程火力打击等非对称优势的介绍，参看 Brig Gen Itai Brun [IDF],“ 'While You're Busy Making Other Plans' — The 'Other RMA' ”[当你忙于制定其它计划时——其它军事变革],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3, no. 4 (August 2010): 535-65.
25. 关于以色列在战争前夕的战略的更多介绍，参看笔者文“Deterrence by Default? Israel's Military Strategy in the 2006 War against Hezbollah”[预设威慑？以色列在 2006 年对真主党战争的军事战略],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5, no. 1 (February 2012): 95-120.
26. 见注释 22 中笔者对本 - 鲁文将军的访谈。
27. 笔者 2010 年 6 月 24 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对 Dan Halutz（哈卢茨）将军的访谈。
28. 笔者 2009 年 12 月 22 日对 Giora Eiland（埃朗德）将军的电话访谈。
29. 同上。
30. 见注释 3 中“威诺格拉德委员会提交最终报告”，第 19 点。
31. 见注释 28 中笔者对埃朗德将军的电话访谈。
32. 见注释 22 中笔者对本 - 鲁文将军的访谈。
33. 见注释 27 中笔者对哈卢茨将军的访谈。
34. 见注释 22 和 27 中笔者对本 - 鲁文和哈卢茨两位将军的访谈。
35. 见注释 22 中笔者对本 - 鲁文将军的访谈。
36. 见注释 27 中笔者对哈卢茨将军的访谈。
37. 见注释 27 中笔者对哈卢茨将军的访谈。
38. 见注释 22 中笔者对本 - 鲁文将军的访谈。
39. Hew Strachan,“The Lost Meaning of Strategy”[战略的意义之失], Survival 47, no. 3 (Autumn 2005): 49.

达格・亨里克森空军少校（Maj Dag Henriksen），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博士，现在挪威皇家空军学院担任空中力量学高级讲师。本职专业为战斗机控制员和空战管理官，曾在 2007 年派驻阿富汗喀布尔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联盟联合作战中心担任空中管理官。亨里克森少校写过有关空中力量和战略的多篇文章及专著。他是挪威参谋学院 2010 年毕业生，现作为客座研究员受聘于美国空军在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基地的空军研究所。